

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

朱 雯

《苦难的历程》是苏联作家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3—1945)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这个三部曲,阿·托尔斯泰前后写了二十年。第一部《两姊妹》始于一九一九年七月,那时候他侨居在巴黎。第二部《一九一八年》始于一九二七年。第三部《阴暗的早晨》完成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正是法西斯德国侵袭苏联的那一天。在这个三部曲一起付印之前,作者又把前两部作了仔细的修改。

整个三部曲是描写苏联人民的一部英雄史诗,它不仅广泛地描绘了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俄罗斯生活,为那一阶段的伟大历史事件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而且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受考验、取得伟大胜利的史实,特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受到革命锻炼、与人民相结合、逐渐领悟社会主义伟大真理所经历的迂回曲折的过程。一九四三年,阿·托尔斯泰曾把这部史诗的写作经过告诉读者:“《苦难的历程》就是作者的良心所经受的一段痛苦、希望、喜悦、失望、颓丧和振奋的历程,是对于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感受。这个时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初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才告结束。”^①因此,这个三部曲的主题,作者在《自传》中明确地指出,是“回家,到祖国之路”^②。

三部曲的第一部《两姊妹》所描写的时代,是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前夜。故事在彼得堡展开,作者以锋利的笔触深刻地揭露了当时资产阶级那种腐化、糜烂、堕落的生活,特别是通过对象征派诗人贝索诺夫这个人物的刻画,无情地抨击了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的颓废派艺术。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了,“旧的生活似乎已经没法忍受。人们都以幸灾乐祸的疯狂来欢迎这一次战争”。在这里,作者借一个报馆编辑的发言,揭露了自由主义者和旧知识分子跟沙皇妥协的实质:“……我们任务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反对沙皇政权既不能退让一步,而在威胁整个俄罗斯国家的危险面前,我们又必须支援这个政权。……至于谴责沙皇政府把俄国拖入战争,在目前还是次要问题。”战争开始不久,物资缺乏,物价飞涨。俄国的原料停止出口了。进口的只有炮弹和作战物资。田地荒芜,几十亿纸币涌进乡村,农民不愿意出卖粮食了。战争是失败了。于是民情愤激,甚至连贵族上层分子也都感到沙皇政府的统治已经面临完全崩溃的边缘,认为沙皇的佞臣拉斯普庭是造成国家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因此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夜,“这个皇廷的最后捍卫者、这个农民、这个盗马贼、这个疯狂的妖魔”终于被人暗杀了。两个月后,二月革命爆发了,成功了,然而完成革命的工人和农

民却并没有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果实,因此尽管沙皇已经退位,但是大家都在怀疑,“二月革命以后,到底改变了些什么呢?他们固然把沙皇去掉了,可是情形却越发混乱了”。于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号召“工人和农民必须夺取政权,马上结束战争,在自己的土地上以及在全世界建立新的、正义的秩序”。

第一部《两姊妹》的卷首题词“啊,俄罗斯的国土!”(摘自俄罗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洋溢着作者对于祖国的热爱;卷末几句对话:“伟大的俄罗斯固然是毁了,一点不错!……然而只要我们还留得有一个县城,俄罗斯就会从那块土地上重新生发起来……”,充满了作者对于祖国的前途的信心。然而在第一部里,作者主要还是在描写家庭生活和恋爱生活,描写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爱称卡嘉)跟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史摩珂甫尼考夫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卡嘉在丈夫死后跟伐吉姆·彼得罗维奇·罗欣的恋爱生活以及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爱称达莎)跟伊凡·伊立奇·捷列金的恋爱生活。小说中几个主人公,好象都沉浸在恋爱里头。达莎说:“天下没有再比爱情更伟大的了。”捷列金说:“只要目的是为了爱,那么我做什么事都是对的。”罗欣也跟卡嘉说:“岁月会消逝,战争会结束,革命会沉寂下去,只有一样东西是亘古长存的——那便是您那柔和的、温顺的、亲爱的心。……”因此,作者自己也承认:“《两姊妹》里并没有写到远景。那时候我还是很盲目的。这部小说不是历史性的,它不过是一个人对于那个时代的一种感受罢了。”

第二部《一九一八年》所描写的是一九一八那个暴风雨的年头。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立刻就遭遇到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的拚死抵抗和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他们妄想趁苏维埃政权立足未稳的时候,一下把它扼死在摇篮里。作者把故事移到了南方,描写了哥萨克首领卡列金的惨败与自杀,描写了由科尔尼洛夫、阿列克塞也夫、邓尼金在罗斯托夫组织的白卫“志愿军”所发动的反人民战役,描写了顿河流域地区哥萨克部队的反革命叛乱,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哗变,反革命的萨马拉政府(所谓立宪会议委员会)的组成,无政府主义分子马赫诺及其娄罗们的土匪式的行径,社会革命党人萨文可夫的特务组织的阴谋活动,黑海舰队的凿沉,武装干涉者及其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走狗们所施展的白色恐怖手段(恶毒地谋刺革命领袖列宁)以及苏维埃国家为回答白色恐怖而宣布的对敌人加强镇压,这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仿佛影片一样闪过读者的眼前。在这国内外敌人向苏维埃国家疯狂进攻的年头,苏维埃俄国很困难。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人每两天只能得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俄罗斯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之下,经受了极为严重的考验,在各路战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武装干涉者以及白卫军企图扼死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最初的阴谋。作者热情地歌颂了俄罗斯劳动人民的史无前例的英勇:他们忍受了饥饿、贫困、伤寒症的折磨,跟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无比英勇的斗争,奋不顾身地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斗争中,他们团结了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他们的业绩到处被人们带着惊惧和羡慕的心情谈论着”。“然而,”作者告诉我们,“这一切仅仅是伟大斗争的开端——在一九一九年的主要事件之前的力量的检阅。”

在这一部里,题材的范围显然是扩大了。故事所表现的不只是几个主人公的家庭生活和恋爱生活,而是与重大历史事件交织起来的错综复杂的画面。英雄的俄罗斯人民本身在小说里出现了。作者两次描写了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描写列宁出现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和一个工人群众大会上),把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爱戴的领袖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了。“……一抹

忠厚的、爽朗的微笑忽然照亮了他的脸。个个人都明白：这是咱们自家伙儿里头的一个！他们欢呼着，鼓着掌，跺着脚。……”作者也描写了工人和布尔什维克的坚毅性格，塑造了华西里·罗勃莱夫和计谟沙的生动形象，通过无数动人的事例，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在反对白匪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间所起的领导作用和决定作用。而另一方面，作者更深刻地暴露了国外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对布尔什维克和工人的疯狂憎恨与残酷屠杀。“在一株树和一根电线杆中间架起来的杠子上，临风摆荡着七具颅长的尸体……这些都是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里的共产党员。”白卫军进了城，“水兵、红军兵士以及一切看样子很穷苦的人，都不加审问，被吊死在电线木杆上。那几天里，有三千具尸体用运货马车给装到了海边”。即便是那些仅仅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也被逮捕，“他们的胳膊马上给反绑在柱子上，四个健壮的哥萨克就用皮鞭抽打他们的脊背和屁股。皮鞭发出呼呼的响声，先是衬衫和裤子，随后是身上的皮肉一块块飞裂开来，鲜血打梯级上淌下去，活象在屠宰场里。……”

第三部《阴暗的早晨》所描写的时代是从一九一八年底到一九二〇年底为止。在这里，作者继续描述了人民群众的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活动，表现了俄罗斯人民为反对白卫将军克拉斯诺夫、邓尼金、马伊—马伊夫斯基、斯枯罗、弗兰格尔所进行的英勇斗争。那些白匪头子们得到了国际帝国主义的资助与支持，一次又一次地向察里津进攻。在党的号召之下，察里津的工人们都停止了工作，拿起了武器。一天之间，他们便堵住了白卫军突破的缺口，击退了敌人。但是由于托洛茨基及其走狗们在南方战线所进行的破坏，苏维埃军队遭受到一定的挫折。白卫军逐渐向莫斯科进逼，苏维埃共和国陷入了极其严重的情况。幸而布尔什维克党及时地把托洛茨基的走狗们从司令部中清除出去，派遣斯大林同志去南方战线组织粉碎邓尼金的工作，于是，俄罗斯人民“尽管有伤寒病、饥荒和彻底的经济崩溃，却组织了一次强有力的反攻，使企图扼杀和瓜分红色俄罗斯的一切国际阴谋全都粉碎了”。

在这里，作者突出地描写了红军部队的成长和壮大，描绘了苏维埃骑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歌颂了布琼尼旅团在萨尔斯克大草原上的战斗和胜利。在这里，作者不仅表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而且也表现了人民力量的源泉。“为列宁的理想所鼓舞——只有理想，因为在俄罗斯既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他们相信自己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强大，相信在他们那贫困的国家的废墟上可以在最短期间建成一个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里，作者鲜明地刻画了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如楚盖、伊凡·高拉），而且生动地描写了布尔什维克的高贵品质与伟大精神给予人的巨大的力量。当共产党员旅长伊凡·高拉壮烈牺牲以后，赖杜金站在他遗体旁边，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他说：“今天，我们的死敌杀害了我们一位最优秀的同志！……他曾经教导我们，这步枪为什么要发给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我请求……接受我入党的申请……”

小说在令人鼓舞的、充满着乐观气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中结束：“反革命的顽强的、血腥的、令人窒息的凶锋已经给挫折了，生活正在走着上坡路，再熬几个月的穷困和苦难，就会有新的粮食，而复员的红军就会从事和平的劳动——复兴那被破坏的一切，建设新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一切的苦难，受了几百年压迫的痛苦，都会被忘记了。……”最后，作者描写了一次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列宁坐在主席台上，工程师克尔齐惹诺夫斯基作着关于“俄罗斯电气化”的报告：“……俄罗斯已经从剥削的枷锁下永远地解放出来，我们的任务是要用电火那不会暗淡的光芒照耀我们的祖国……”

阿·托尔斯泰在创作《阴暗的早晨》时曾经给自己规定：“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创造布尔什维克的性格，但不是创造我们文学中已描写得非常详尽的这种自发游击队员的性格，而是

创造有组织性的、有纪律性的、有思想的、英勇的、‘举态自如’的、克服了那些几乎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的人的性格——一九一九年的恐怖战争中的胜利者的性格。”小说本身证明，作者出色地完成了他给自己规定的这一任务。

这一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几乎包括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全部重要历史事件，因此场面之大，人物之多，使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伟大史诗的特点。从彼得堡到边远的外省，从荒僻的乡村到战火炽烈的前线，从乌克兰到莫斯科，从和平的生活到残酷的战斗，从暴风骤雨的描绘到清流鸟语的抒写……在上百个人物当中，有真实的，有虚构的，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工人，有农民，有兵士，有知识分子……作者以卓越的才能、高超的手法、精炼的语言，鲜明而生动地刻画出每一个场面，塑造出每一个人物，使这部长篇史诗成为苏维埃文学中最巨大的著作之一。

在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多的人物中间，作者安排了达莎、卡嘉、捷列金、罗欣等四个人物的故事；通过他们对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痛苦的探索，对自己在争取新俄罗斯的斗争中的地位和幸福的追求，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旧知识分子怎么样经过错误和迷惑，经过锻炼和考验，终于找到了靠拢人民、走向革命、最后成为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和建设者的道路。

达莎和卡嘉是萨马拉地方一个医生蒲拉文的女儿。故事展开的时候——一九一四年，卡嘉跟她的丈夫尼古拉住在彼得堡，达莎因为要上大学念法律，也寄寓在姐姐卡嘉家里。跟当时一般贵族、资产阶级一样，她们过着豪华而奢靡的生活。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了，于是她们这种远离人民的生活统统给粉碎了。激于爱国心，她们先后参加了医护工作。正如达莎所想象的，“她从前生活在高原上，从那儿望不到地面；她跟周围的人们一样，过着只顾自己的、高傲的生活。可是她已经从云端里掉下来，掉进了鲜血，掉进了泥泞，掉进了这个弥漫着病体气息的医院。”卡嘉也“第一次觉得与她周围的生活发生了接触。她变得喜欢龌龊的、艰苦的工作，怜惜她所照料的那些人们”。可是她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会活到能够没有痛苦地恋爱的一天”。即使在卡嘉的丈夫尼古拉被革命的士兵用钢盔砸死以后，她们也还是没有觉醒，仍然沉醉在恋爱和个人的小天地里。卡嘉跟亡夫的一位同事罗欣结了婚，达莎也跟捷列金过着婚后的愉快生活。然而暴风雨般的革命以及随着发生的国内战争使她们的个人幸福与个人美梦完全破灭了。她们经历了“苦难的历程”：姊妹分离了，夫妇失散了。卡嘉孑然一身，伴着她的只有一包千缝百补的衬衣，苦难、流浪、饥饿，把她锻炼得坚强起来，使她终于获得了新的品质，找到了新的幸福，看到了那“给饥饿、寒冷、破产和战争折磨着的人民那一切希望与思想所向往的未来”，那“通往一座遥远的、蓝幽幽的城市——复杂、富丽、美妙——在那儿每个人都会找到幸福”的道路。当她跟丈夫、妹妹重聚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一个人民教师。

达莎在丈夫捷列金参加红军上了前线以后，经历的过程还要曲折复杂得多。她被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包围起来了；由于她的阶级出身和旧的思想意识，她落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罗网，同时又被萨文可夫的特务组织所利用。一个特务唆使她窥伺列宁的行踪，设法打入共产党内。可是当她乔装一个女工，混进一家工厂，听到列宁的讲话，看到人民的力量以后，她受到了感动。她想起列宁所说的“发挥一切的力量，冒一切的危险，甚至生命——为了劳动者和被剥削者……”，觉得“为那些被侮辱、被压迫的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崇高的吗？……”于是她拒绝参加这种卑鄙毒辣的特务活动，然而她还没有识破更隐蔽的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因而没有跟无政府主义的特务分子割断关系。直到她亲眼看见了反革命分子残杀人民的血腥暴行，甚至连她最为珍视的身体也受到了暴力污辱的威胁，她这才醒悟过来，逃到父亲家里。但是当父亲（那时已经在反动的萨马拉临时政府中当“次长”）暴露出反动阶

级的狰狞面目，企图陷害她丈夫的时候，她机智地救出了丈夫，而且跟父亲作了一场坚决的斗争。父亲要绞死她，于是她从萨马拉逃出来了。在“暖房里长大”的她，“如今却走到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浩劫里面”。经历了贫困、饥饿、疾病，她后来遇上了红军，便留在部队里当护理员。这以后，她与丈夫重聚，在红军部队里搞戏剧工作，参加战斗，经受革命的考验，“永远为着改造自己，为着叫自己洁净，为着使自己完满而奋斗”。

工程师捷列金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工人们都认为“他是个老实人，是个忠厚人，清白干净，是个自己人”。在一次罢工斗争中，他的名字“也被列入同情工人的嫌疑者名单里”，后来他又“顶撞那经理，而且提出辞职了”。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他上了前线，被德国人俘虏了，可是他勇敢而机智地跟敌人作斗争，终于逃出来了。他不仅热爱祖国，而且相信人民的才能、力量和未来。他认为俄罗斯人民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种有感情、有天赋、有力量的人民。他同人民比较接近，在共产党员工人华西里·罗勃莱夫的影响之下，对人民也加深了了解，然而既是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受到革命的锻炼以前，还不可能马上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因此，他在十月革命初期，还憧憬着跟周围的生活、跟人民的苦难和斗争，跟战争和革命隔绝的个人幸福。他还“打算等战争一结束，为达莎安排一个幸福的窠巢”。可是他发现自己尽管对达莎那么关怀体贴，而她却还是跟他疏远的时候，他才明白要争取达莎的爱和个人的幸福，首先得和广大人民一起争取祖国的幸福。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后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他一直在红军部队里工作，在战斗中受考验，深刻而且正确地了解了捍卫革命的战争的意义。因此，“他在团队里竟成为最可靠、最明事理、最刚勇的作者之一。危险的任务托付给他，他总是出色地把它们完成了”。在战争将近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英勇的旅长；在听了关于“俄罗斯电气化”的报告以后，他又满怀信心地准备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他的一切知识和力量。

这些人物所经历的“苦难的历程”证明：离开了祖国和人民的巨大的、共同的幸福，个人的小天地的幸福是不可想象的。作者通过另外一个人物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幸福是用鲜血争取得来的。”

罗欣是一个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走向人民、走向革命的过程自然更曲折了。他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沙皇军队里的军官。他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热爱着俄罗斯，热爱着祖国。可是他远离人民，根本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因此，当人民拒绝将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他绝望了：“难道我们就把这一切都服服帖帖地放在德国人的脚下吗？……我们要打下去！……我们要保卫俄罗斯！而且要惩治他们……残酷地惩治他们。”惩治谁呢？他要惩治的是俄罗斯人民！这种反动的、与人民为敌的思想感情，连他妻子卡嘉也表示反对，可是他宁愿牺牲自己对卡嘉的爱，狠狠地对她说：“我恨你！滚你的！……你去做布尔什维克吧！”他把拯救俄罗斯的希望寄托在白卫军身上，投入了白卫军来与人民作战。在参加反人民战争的一段时期里，他亲眼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人民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白卫将军把军队出卖给武装干涉者的黑暗勾当，看到了白卫军的暴戾残酷和荒淫无耻，“罗欣看在眼里，心头冒起一阵怒火。‘浇上火油，把这些混蛋烧个干净。……’”他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这样坚决与人民为敌，“他真的做得很对吗？他到底是对的吗？”“他的同团军官们所信仰的是种什么样的真理呢？他自己所信仰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真理呢？……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真理，才必须屠杀俄罗斯农民呢？”经过反复的、剧烈的思想斗争（他甚至想自杀，以了此一生），后来他终于离开了白卫军。但是在他没有领悟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

意义之前，他做了无政府主义分子马赫诺的俘虏；又经过不断的怀疑、动摇和探索，最后他才坚决地站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参加了红军，跟千千万万苏维埃俄罗斯人民一起，英勇地捍卫社会主义的祖国。他认识到“俄罗斯已经诞生了新人，这个人要求人们都有象人一样生活的权利。那不是个梦，那是我们用枪尖来奋斗的一种理想，一种可以实现的理想”。在展望恢复国民经济远景的时候，他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表达了俄罗斯人民共同具有的思想感情，他跟卡嘉说：“为了大家的幸福，我们将要改造这个世界。……所有在这个大厅里的人，谁都准备为这个事业献出他们的生命……”

三部曲第二部《一九一八年》卷首那几句题词：“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硷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这些主人公脱离人民、甚至与人民为敌、到走上和人民打成一片的道路，正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旧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者的道路，也正是伟大史诗《苦难的历程》的作者阿·托尔斯泰亲自摸索、亲身体验过的道路。

阿·托尔斯泰出生在贵族家庭里，同象征主义者有过联系，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国外，在巴黎和柏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时期。在那里，我明白了做一个流亡者，做一个脱离祖国、不足轻重、毫无益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人所需要的人的滋味了”。^③因此在一九二三年，当革命获得了胜利，全国人民全力以赴从事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时候，他便返回祖国，转到革命这方面来，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是一个从贵族府邸的世界出来变成建设人民文化的参加者的作家。对他的生活和创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自己也承认，“假如没有革命，那么等待着我的充其量只是波塔片柯的命运：革命前中等作家那种灰色而平庸的活动。十月革命把一切都给了艺术家的我了。”^④他还说，“三十年代初叶，在作家知识分子的行列中，受了社会主义决定胜利的影响，发生了深刻的思想上的转变”^⑤，但是他真正靠拢人民、决心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在大转变的那一年（一九二九年）以后。直到那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五年计划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农业的集体化、苏维埃国家的巩固、在思想问题上党的正确政策的有力影响之下，他才消除了过去的摇摆，克服了残余的迷惑，结束了多年艰苦的探索，全心全意地加入社会主义积极建设者的行列。在谈到写作三部曲时所花的二十年工夫，作者自己也说：“在这段期间，在我的生活里，以及在我对生活、对现实、对我们的斗争的态度上，我的看法都较前更加成熟、更加深刻了。”^⑥因为作者完全理解“艺术家是和自己的艺术一同成长的。他的艺术是和他所反映的人民一同成长的。艺术家是和他所创造的英雄一同成长的”。^⑦长篇史诗《苦难的历程》，正鲜明地标志着作者在思想和创作上的这种发展和成长。

注：

①⑥ 阿·托尔斯泰：《三部曲〈苦难的历程〉是怎样写成的》。

②③ 阿·托尔斯泰：《自传》。

④ 《阿·托尔斯泰全集》第13卷第494页（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社1949年版）。

⑤ 阿·托尔斯泰：《二十五年的苏维埃文学》，见《苏联文学之路》（时代书报出版社出版）。

⑦ 阿·托尔斯泰：《致青年作家》，见《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